

# 少壯知行錄

段輔堯 原著

編者按：湖南耆宿，國民大會代表段輔堯先生，早年撰有少壯知行錄印贈親友未對外發行，為配合本期吳伯卿先生「平生風義兼師友」大作，特選錄段輔堯先生原著，以供讀者參閱。

一個年逾四十的人，當開始寫他的事略底時候，一陣「不足畏也已」之感即刻浮現在心頭，既已踏上「無間焉」的途程，還有什麼事略可記呢？但再想到孔子所說的：「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自己覺得尚未為人羣所惡，至少自己尚未厭惡自己，更想到「四十而不惑」這點，頗以當此存亡絕續之交，自己的思想行動尚能一貫，勉強可說「不惑」，基於這一點自信，姑且一記我少壯時代的知與行，以和同時代或次一代的青年朋友們共勉吧！

## 求學與革命

當我入高小的那年，正值五四運動發生，我的家鄉——湖南益陽——的中小學生也舉行遊行，我的年齡較小，平時站在末尾的反站在前列，一個寫着打倒賣國賊的紙紮的槌子就緊緊舉在我的小手上，從此我的內心就發生了救國的念頭，每逢愛國運動無不熱烈參加，口頭演講，化裝宣傳，總是忙個不停，後來因為我演講頗能動聽，或者人們以我年輕可愛的關係，居然受同學們的推舉，充當出席全縣學聯會的代表，當時縣中發生新舊派，學生當然參加新派方面，新派的益陽公民自治會創辦益陽旬刊，創辦的那天曾舉行了

旬刊的成立會，並曾攝影留念：那僅十二歲的我就是當中最小的的一個。

五四運動前後學生運動都是為了外交問題，而當時的外交官也不為學生所諒解，我一面參加愛國運動，一面勤習英語，有意將來學習外交，圖以外交救國，當時我在班內確屬英文最好的，進中等學校時我就入了英語專修學校，不到一期，因為家長發覺沒有國文而嚴切制止，於是我的第一志願就隨之改變了。

在中學期內除了英文以外，對國文也漸感興趣，尤其因為留心時事最愛看報紙，我曾經邀集同學組織學社，想從研究學術着手，藉以鼓吹愛國思想，中經一、二人以冷淡態度處之，我的熱忱也隨而轉入行動了，前後發生的「五卅」運動、長沙「六一」慘案，我都是積極行動的一員。

民國十四年春那驚人的國父逝世的噩耗傳來，長沙的學生們多如喪考妣！因為青年們一般的心理寄望於國父領導南方，深恐國父死後南方革命局面不能保持，國是將不堪問！所以大家熱血沸騰，都願繼承國父遺志，於是我就在那年新秋加入國民黨了，那時我已卒業中學，為了革命與學生運動，就進了比較自由的羣治大學。接二連三的收回金剛碼頭，反關稅會議，反

吳運動，湖南的黨已由反帝反軍閥的運動，進一步發動政變迎接北伐了，當省長趙炎午先生辭職離長的次日，長沙舉行人民大會，組織臨時人民委員會，我當時就是實際從事工作之一員，當時長沙警備司令龔浩實際以同情的態度並透過同鄉的關係掩護了我們這次的運動，其間一段黑暗時期，唐生智退往湖南，葉開鑫進駐長沙，我們一批露了面目的黨人都在密緝之內，我祇好在十五年的夏初赴北京就學了。

剛到北京不久，就在小同鄉益陽學友會的歡迎會上展開了讀書與革命的論爭，結果大家勉強同意我的讀書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讀書的結論，是年秋，廣東的國民革命軍進軍北伐了，我就在北京參加黨的活動，也為着便於革命的關係，考進了與國民黨較有歷史關係的民國大學，翌年南北鐵路交通已經斷絕，家庭接濟已漸感困難，我們一羣革命的學子開始向革命的老家——廣東投奔了，雖然在穗辦好了轉學手續，隨即回湖南去了，十六年憑革命的資歷由黨證明再進國立武昌中山大學，就算馬馬虎虎結束了大學的學習生活。老實說，我在學校受教育的收穫有限得很，我的知識多半從自學中得來的，我的知識之原始基礎，多賴賢德的後母所教的一千方字，那是我

在六、七歲就能認解能寫的基本文字，父親也有時親自督教，有一次我要小便，父親罵我懶牛懶馬尿尿多，他老人家以為我藉小便偷懶，硬說果要小便就洒在房裡，我真的大洒特洒了，弄得房間的地板濕透了半邊，父親不免啼笑皆非！可見我小時確實不會偷懶。入高小時，因為我以前在家讀的是改良私塾，算術未學好，以後我算術特別差，最後簡直懶得用功了，以致理化也不行

，所以我至今對自然科學的知識特別感到貧乏，這一懶竟造成了我一生知識上的缺憾！可是我對社會科學却在自學中下了一番工夫，我對治學譬如建塔，先要將地層考察清楚，即是要先讀好史地，然後奠基即是學好經濟學，其次一級一級，那就是社會、政治、法律、文學藝術諸般學科之系統研究，最後是為塔頂，究竟是東方式抑或西方式；近代或古代；那就有賴於哲學的綜合與批判，這就是所謂藝術之塔，學術之宮。

我是一個革命黨人，我對中國革命曾經過深切的體認與研究，我在中學時代熟讀過「五四」運動後盛行的出版物



段輔堯（後排中）任戰地政務財稅金融訓練班主任時與老長官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上將合影。

——新青年合訂本，裡面有各種新思潮的代表作，在大學初期比較的研究過各種主義，各國革命史，當時流行的刊物：國民黨的覺悟，國家主義派的醒獅物：共產黨的嚮導是經常閱讀的，最後確定了我的信念；一個永遠不變的三民主義信徒，儘管革命的過程中發生了錯誤與毛病，但祇有始終用這服藥才可醫癒，我們的黨國要人過去被人家以貪污無能罵得體無完膚了，但我們一看人家國家的歷史，就以美國為例；南北戰爭結束後，北方的資本家不是一樣的發勝利財？官吏們不也是很多貪污無能嗎？當時的總統格蘭特對他政府中營私舞弊的默許，和對貪污所採取的友好態度，豈不是很顯明的嗎？弄得人民怨聲載道的喚出：「華爾街所有所治所享」的呼聲

，改革運動風起，以後經過國會立法，才加取締，可是人家的好處就在這裡；能够始終以他們的民主主義醫治他們國家的毛病；我們的黨人為何不知深省，以我們的三民主義醫我們的毛病呢？中國的人民具有慧眼，能够分辨善惡，惟有投機變節的黨人非在匪黨的屠刀下不能獲得教訓，現在正是他們嘗試的時候了，我們呢？「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我們祇要從此親親而仁民，就可以偉大的三民主義的光輝遍照大陸，祇要我們身體而力行啊！以「吾道一以貫之」這也就是我對中國革命永恆的信念。

### 任教與為政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這的確給擔任教育的人們一個很好的警惕；我自己深深感到學養的不足，偏偏達到許多教育工作給我擔任，祇好本「教學相長」之道，兢兢業業的從事，我在長沙羣治大學時期，就開始擔任自治會主辦的平民學校校長，固然是掩護革命，也實在想為平民施以補習教育，又憑了我對民教的經驗，我還在湖南紡紗廠做過工人補習學校的教務主任，所以我對勞工羣衆的生活與心理是相當了解的，後來我在民國二十六年出任湖南省民教館館長，直到二十八年冬，隨同省府遷至沅陵，並承國立藝專校長蔭固同志將該校所建的校址相贈，正在恢復工作，並繼續刊行具有二十餘年歷史的通俗日報之際，而教育行政當局因恐與臨時性的社教工作團工作重複，要將本館遷至永順，而於通俗日報則令停刊，以不忍自己擴充的事業毀於自己之手，才堅決辭去。後來果為臨時參會所質詢，並通過

恢復通俗日報的議案，可是我並未與聞其事，但該報雖已單獨恢復，不到半年仍舊停刊了。我在省民教館任內，值得敘述的有兩件事：一個是實驗民衆學校，一個是通俗日報，前者由我創辦，校址設在鄰近東車站的校場平民區，坪內分成成人、婦女、少年、兒童四班，日以繼夜的教學，可稱爲三部制，學生人數達三百餘人，多半是車站的伕力本身或其妻子，不到半年這個區內的环境風習完全改觀。本來，長沙車站伕力的習慣是很壞的，對客人的行李強搶挑運，索取重價，旅客無不叫苦，有一次我到漢口出席臨全大會歸來，剛一下車，行李即被伕力提去，我不禁大叫，以爲還是從前一樣搶運行李的，而這年輕的伕力滿面笑容的答着：「先生！我是實驗民校的學生特爲先生拿行李啊！」我不禁啞然面帶愧色的無以相對，這就是民教的影響之一。還有一次在長沙大火之後，我到長沙正在人力車上行進，忽然一個小孩丟下一張小報放在我的車上，最初我以爲是商店大減價的傳單，檢來看時方知是晚報，連忙叫那小孩，「你沒有拿錢去啊」他答道：「不要錢」「爲什麼？」我說，小孩答道：「我是民校的學生呵！」以後甚至連看相算命的長沙有名之羅筆直館主人底女兒羅輝女相士也是本館附設民校的學生，我的弟弟的名字僅一字之差，遂自認爲是我的學生而不取分文，像這類的事不勝枚舉，這是我辦民教的一點安慰。再就通俗日報來說，最初接辦的時候僅發行三千多份，大半贈閱的，我到任即改版，使形式內容爲之一新，另闢副刊「天經地義」一欄，並加印星期增刊一張，

注重學術探討，尤爲青年所歡迎，後來竟銷到萬餘份，普及全省各鄉鎮保及中小學校，而爲當時全省各報發行的總和，教育部的社教司司長陳禮江氏過長視察，親見該報有裨民教，爲全國冠，自動簽請由部每月獎補二百元，同人均感興奮；不料後來該報竟隨我辭職而停刊，縱經復刊亦不能持久，不免引爲憾事。省府因爲我辦通俗日報的成績不壞，要我接辦國民日報，雖曾努力改良，總不如通俗日報影響之大。憑我的經驗，小型報的效力可以大過大報，它的先決條件是編輯方法的改變，我過去是採綜合式白話體，以簡短精粹的姿態，而將全部原始新聞改編，學術性的論文則在增刊發表，社論以短評爲主，有價值的言論並不在字多，當人事繁雜之今日，一切以精美爲勝。

民教的工作告一段落，政治教育的工作開始了，我受了兼主席薛伯陵先生之命，出任湘省幹訓團政治總教官，他給我的指示是：「政治是光明大道，只可指導青年走直線，不可走曲線」這確是至理名言，過去提倡走曲線的，今日多已離經叛道，不知誤了多少天下蒼生！

我在團的講義，有革命哲學體系暨政治典範令等集，前者以對 總裁學說頗多闡發，蒙侍從室兩次傳諭嘉獎，我對哲學的基本觀念是以中國傳統哲學爲主，配合西洋哲學而成體系，我將哲學的本體論以「誠」爲基點，認識論以「合」爲基點，方法論以「中」爲基點，與西洋哲學的實體一元論頗相吻合，誠實原爲一名辭，「誠」字即爲實體之代名詞，宇宙間的「天」和「人」都

不過是一個實體的代名詞而已。所以中國的哲學，實爲世界最高的哲學，我們要以中國的哲學的優越擊敗共黨「哲學的貧乏」，這種哲學思想對當時湘省的黨政團警幹部，不無好的影響。

我在幹訓團兼負了黨部團部的責任，對黨團的活動配合短期教育，相當盡了示範的作用。

二十八年夏季季先後奉青年團中央團部之命視察湘贛兩省團務，後者是以湘支團幹事的職分作交換視察，我發覺江西的團務是以青年運動的方式進行，而湖南團務是朝政治運動的道路急馳了！我每當對青年同志們講話時，我始終是強調政治活動配合政治教育，青年運動方能朝着正軌前進，最近有個朋友談到，有幾個省區的幹訓團訓練出來的學員。因爲另成一派，增加了地方的摩擦與動亂，以致未見其利而深受其害，湖南幹訓團雖一度因教育行政負責非人，不免減低了一時的效能，但一貫的在直線上發展，至少未有如他省之害，這點是負政治教育責任的人堪告無罪於地方的。

聞名世界的長沙三次會戰，每次以越過新牆河開始，而以瀏陽河決戰，這個第一行政區首縣的瀏陽具有戰略上之重要價值，薛兼主席爲了軍事上的需要，希望地方黨政能够配合戰鬥，所以我出任瀏陽縣長，三辭不獲，祇好勉強赴任，一共作了整整三年，在三年報政之餘，趁着三十年春季的戰爭沉寂狀態始堅辭獲准。

我在縣役中，首先遭遇到旱災，而當時的軍糧民食又異常的緊急，城鄉漸有騷動的迹象，我一面召集糧食會議，決議在縣城由縣倉商會糧食

公會慈善團體，會同舉辦平糶，在鄉鎮除了仿照辦理外，尤責成各姓氏宗祠自行負責救濟，本人親自巡視督辦，熱心平糶者獎，囤積居奇者罰，均以公開方式激勵，不料共黨潛伏份子乘機煽動，張貼標語，糧食公會主席原屬奸徒，也忿忿不理，祇得拘予逮捕，後來因縣民檢舉該糧食公會主席陳道金平時罪惡，積案如山，此回糧食風潮復具蓄謀，於是依法處死，全縣人民無不稱快！但以天仍不雨，人民頗以縣長不禱神求雨，間有怨言，我雖愛民惟不願提倡迷信，遂順民情定期絕食一日，復洽商駐軍，協力車救，不料竟於是日天降甘霖，人民歌頌載途，不絕於耳，不久即告豐收，糧食風潮終告無事。由此，可以看出，祇要執政者有辦法，肯苦行，能兌現，不怕匪黨煽惑，不怕奸徒作惡，他們畢竟祇能欺騙取巧於一時，我們能言能行，沒有不得到人民的同情與愛戴的。

其次是遭遇作戰，長沙二次會戰，瀏陽縣境的西北區都已淪陷，敵人離城僅二十餘華里，縣境已無國軍，敵人便衣隊在敵機不斷轟炸中，偽裝傷兵混入城內，當即發覺，全部捕獲，為首者訊明正法，當時敵人的計劃，先由便衣隊進城以放火為號，然後騎兵見火進城，因為便衣隊全部捕獲而計劃失敗，貽誤了攻城日期，三十年九月一日敵人開始總退却，瀏陽縣城終安然無恙。當先天最緊急的晚上，我親自巡視城郊，在午夜的分於北郊，遭遇了回師的友軍，在彼此情況不明的當中幾乎發生誤會，好在前哨兵警都有相識的，這樣皆大歡喜的請出了雙方的長官在橋頭見了面，那就是廿六軍蕭之楚軍長和我呵！遂即商定當晚的防務，城內由警察負責，城郊由軍隊負責，在彼此喜出望外的短短會晤中緊緊的握手道別了。

翌日，敵人開始潰退的消息傳來，蕭軍奉命清掃湖北一帶戰場，商妥當日下午四時於北門汽車站會合，同時出發，當我到達時，蕭已在等候，他即忙告訴我：「奉命改變任務向金井以北追擊敵人，湖北潛伏的敵人尚不少，您的警力單薄，最好不要去了」我說：「我帶去的警力雖僅一隊人，我可以命令各鄉鎮的警察及國民兵分別集中，清掃戰場的任務，我可以擔負起來」，於是最後決定還是一同出發了，夜過焦溪嶺，宿營嶺下，已無人煙，翌晨蕭軍繼續前進，我就開始我的工作，安撫流亡，集中兵力，搜捕殘敵等……如此，日夜不停的在十二天的日程中，由北而西巡視了十六個鄉鎮，這樣迅速的行動，使人民免於殘敵撤退時的燒殺與地痞的擾亂，這就深深的受到全縣人民的讚美。不到三個月，三次長沙會戰接連的發生了，我們已經有應變的經驗，我手訂的應變要則，已為每個幹部熟讀的秘訣，戰前、戰時、戰後如何工作；都有具體的規定，到時相機進行好了。所以三次會戰敵人雖已達到瀏陽的邊境，我們所擔負運輸補給底任務，及補修據點工事等，成千成萬的人力日以繼夜的工作，我們在緊張忙迫與奮的情緒下度過了三十一年元的元旦，羅卓英將軍以副長官的職份指揮這一方面的軍隊，他的指揮所由南而西而北的逐步推進，我們忙得祇能以電話連絡，最後敵人差不多被擊退了，然後相約在永安市會晤，經他實地的考察，我被舉報「協助作戰有功」而受了長官的嘉獎，後來我奉頒了勝利勳章。

我在兩次作戰中，任務迫使我產生了幾項新的措施，比如為了前方的供應，兵站後方倉庫的糧食補給不上，而鄰近戰場人民糧食的疏散也搬運不及，我針對兩者的需要，由縣府發出了五石十石的糧票，先期曉諭鄉鎮長通告人民，憑票交糧由兵站接收，人民憑票在後方取糧或抵賦，這樣，軍民雙方稱便，三十年深秋的南嶽會議，總裁召見時我報告了這一項辦法，當蒙親加筆記，並於聚餐訓話時指示應予採用。我在縣政建設的計劃中，就本着「以軍事的精神行政，以政治的功能輔軍，施政與備戰並進，增產與供應兼籌」的兩項原則從事工作，自信收到了相當的效果。

其他地方建設方面，我按着重點，分出本末終始先後緩急去進行，三十二年洪水為患，我對事後的賑濟與水利會曾盡力而行，三十三年行政會議評時，瀏陽水利建設列為全省第一，其他創辦民生工廠、農場、縣中等，與今日臺灣的縣政建設比較則不足道了。根據三年縣役的經驗，我覺得對政令的推行不外兩端，一乃為國之事，一乃為民之事，為國之事但求公平，為民之事務須實惠，人民自然踴躍樂從，兼受其益，否則，徒然招致民怨民勞而已。願有志者下縣，有為者下鄉，公廉勤快以赴之！庶幾地方政治的基礎得以及重建，方可完成三民主義新中國之革命建設。

遊 幕 與 從 軍

九戰區長官部為了統一戰區部隊與地方黨政

的戰鬥行動，成立了黨政戰鬥指揮部，我於三十三年春奉調擔任該部的主任秘書，實際上就承充了司令長官的黨政幕僚，不久長衡會戰開始，隨着又是湘南贛北的狙擊戰，一直到三十四年秋南潯線受降，我都是擔任這個責任。

我當時對黨政戰鬥的部署：分戰鬥指導、戰鬥組織、戰鬥實施三方面的工作與運用。指導方面：計劃指導，頒發了黨政戰鬥須知，有如作戰計劃：實際指導，派有黨政戰鬥督導專員，好比督戰官。戰鬥組織：各縣設有黨政戰鬥指揮所，軍民合作總站，國民兵任務總隊，國民抗敵自衛團，類似各兵種的建制，而各有其性能的區分，惟黨政指揮所為聯合作戰中心，負有統一指揮當地軍民合作，國民兵任務，國民抗敵自衛各種工作之責，戰鬥實施：則分戰前的應變工作，戰時的助戰工作，戰後的善後工作，按當時情況參照戰鬥要領行動。就這樣把全戰區的部隊與地方的黨政指揮統一，而使全體軍民協同作戰，故雖在當年敵軍全力攻佔軍事逆轉的情勢下，各縣的政權與地方武力始終健全的配合着國軍不斷的戰鬥，而同時共匪乘機竄擾湘贛的企圖亦為之粉碎。所以黨政戰鬥在抗敵剿匪都具同等重要的意義與作用，這樣的工作，一直到受降才告一段落，後來薛先生任徐州綏靖主任，也還是變通的運用了這一套他自己創造曾經收效的辦法，這是我在高級司令部充當黨政幕僚的一頁，民國廿年曾于同鄉先進龔浩先生在粵任指揮官時，充任過指揮部的政訓處主任，我當時年少，僅僅勇氣有餘，但當我在九戰區工作的時期勉強可以說是「有勇知

方」的了。

從此，更受薛先生的知遇，在他徐州綏靖主任任內，我奉派駐京，國府總統府兩任參軍長任內，我也隨同入府工作，復以成績優異，曾奉國府頒發景星四等勳章。卅七年冬他堅辭獲准還鄉，我也隨同進退，卅八年春薛先生奉命主粵，我應召前往，在大義相維的懇談中，我更無保留的充任了佐治人員。於是我奉聘以顧問兼主任秘書，一直由穗而瓊而臺，在海南防總期內，我兼充辦公廳主任，這一回前後兩年的幕僚生活，使我體會到了幕僚的真實辛苦！在穗時每日平均四百餘件的文電以及幾十封來回函牘的綜核，使我每天要作十二小時的工作才能休息，到瓊之初，因為要兼辦軍務也忙個不了，後來總部成立，業務各有主官，我倒輕鬆多了。在這段幕僚生活中，我覺得有三件事差堪自慰，首如政風的改變；我們作幕僚的從未參加任何地方官吏紳商的宴會，自然說情舞弊的事無由發生；其次效率的提高，在案無留牘當中可以看出，尤其急要事務從未發生過失時效的事，再于大體的顧全，我們自問從無偏袒狹小過激的情事。這是受薛先生開誠布公的心襟所感召，也就是他要以一個超然的外省人出任主幹幕僚的動機。在防總辦公廳內，我對軍機的保密與傳遞的迅速，不敢疏忽，這些我確無負上官的付託。我因為既家居停的知愛，對有關大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遇事也常被諮詢，賓主相得，深深引為幸慰，就以這次海南防衛戰而論，我們因為已經看出國際變化的趨勢，所以才有瓊島的苦撐，但我們體會到了中央的決

策，才毅然決心撤退，事實證明了我們的看法沒有錯誤。薛先生是一位公忠體國的將相，所以我一直在他的感召下，一日未離的做了十年以上的苦幹苦鬥的幹部。

國家多難，書生戎馬，無補於國，無助於軍，遊幕生涯，從軍生活，結束了我少壯的時代。

還有使我不能忘的上官陳伯南先生、何芸樵先生，當年我也曾以客卿的地位深受知遇，尤其難得的我以一個外省人竟蒙支持充當了粵軍出席本黨五全大會的代表，全黨精誠團結以及全國的統一與抗戰，都是以本屆大會為關鍵。何芸樵先生於廿五年秋為促成廣西和平到粵，他曾以楚材何必晉用的大義，邀我同車回省服務，我以最年輕的省府顧問底身份參贊了他後期的幕府。

半生虛度，一事無成；今後漸入老大之門，處此海角天涯，但願再見大陸的塵與土，少年甚望老成，將老更希益壯，我未來的半生還是要奮鬥到底，只求蓋棺論定時，我始終是一個忠實的三民主義信徒。

末了，我要附帶申明的，我這篇充滿了自信的敘述，或者不免受譏有自我誇大之嫌，但我是能對良心與事實負責的。請原諒一個失去了青年時代底中年人追述往事之自述吧！猶如初戀的珍愛：這是青年人之所驕傲。自卑足以損害青年人的活力與勇氣，自謙未免對自己的言行不負責任。恕我今日戒懼的心情存之深處。假使，我因此犯了錯誤，我以中年人的虛懷，深深的承受了這過往的過失而喜而拜。